



胭脂井

慈禧全传之五

高阳 著

慈禧全传之五 胭脂井

高阳 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，袁世凯不回小站的“新建陆军”营地，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，求见荣禄。

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，并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。大约二十年前，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，御医会诊，束手无策，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。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，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，进京请脉，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“骨蒸”重症，细心处方，渐有起色。特降懿旨：“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，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。”这一恩遇，既是酬庸，亦为了地迹官禁，诊治方便。

照历来的规矩，帝后违和，所有脉案药方，逐日交“内奏事处”，供大臣阅看。有那深谙医道的人，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，处方并不见得出色，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。日子一久，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：小产血崩，经水淋漓。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，御医相戒，三缄其口，处方下药，亦就无的放矢了。

薛福辰和汪守正，到底是读书做官的，胸中别有丘壑。病症是看出来，既然说不得就不说！托名症象相似，由积劳积郁而起的“骨蒸”，却将治小产血崩、经水不净的药，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。用“说真方、卖假药”的诀窍，对症下药，果然收功。

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，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，谁又是“莲花六郎”？众口耳传，就是这位丰神俊逸、最讲究衣着的

荣禄。

但是，二十年前的荣禄，并未因此加官晋爵，反倒失意了。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，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坻，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，找个过错，交部议处，将荣禄由俗称“九门提督”的步军统领，一降而为副将。荣禄很见机，引疾奏请开缺，闭门闲居，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。

这是个闲冷的缺分，倒亏他能守得住，一干八年，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，进京祝嘏。正好恭王复起，重领军机，深知荣禄干才，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。就此扶摇直上，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。这一年——光绪二十四年，在四月二十三，皇帝下诏“定国是”，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，由慈禧太后授意，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

直隶总督号为“疆臣领袖”。但是，这个缺分的重要，在于兼领北洋大臣，而从光绪初年，李鸿章督直，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，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，成了真正的“疆臣领袖”。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，勒兵观变，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！

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。一个叫董福祥，字星五，甘肃固原的回子。同治初年，西北回乱，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。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，投诚改编，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。如今官拜甘肃提督、加尚书衔、赏太子少保。所部称为“甘军”，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。

再一个是聂士成，字功亭，出身淮军，是李鸿章的小同乡。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，中日同时发兵援韩，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，以孤军守摩天岭，设伏大败日军，阵斩日将富刚三造，算是淮军的后劲。又通文字，曾匹马巡边，著《东游

纪程》，亦算是儒将。所部号为“武毅军”，半仿德国式的操法，实力颇为可观。

再一个就是袁世凯。甲午中日之战以后，他虽保有浙江温州道的实缺，却不愿赴任，因为道员升监司、升巡抚，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，功名心热的袁世凯，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。于是上个条陈，主张练一支新军，以矫绿营的积弊。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，接纳了他的建议，招募了七千人，就天津以南，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，淮军周盛波的旧垒，屯驻操练，名为“新建陆军”。洋鼓洋号，壁垒一新，深为荣禄所欣赏。

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，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，三年下来，卓然有成，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。这年六月间，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，袁世凯装傻卖呆，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。这样到了七月里，新政展布，如火如荼，皇帝乾纲大振，新党气焰愈盛。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：七月十九，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、许应骙等阻挠他的条陈，不愿代奏，结果礼部满汉尚书、左右侍郎，奉旨一律革职。京中各衙门的长官，称为“堂官”，部里满汉尚书、侍郎共是六员，通称“六堂”，这礼部六堂，尽皆革职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，全班被逐，都是有清开国以来，史无前例的事。

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：“内阁候补侍读杨锐、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，均赏加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事宜。”一切大政，都由“四京卿”拟议，发号施令，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，或交兵部寄递各省。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，原来的军机处，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，变成有名无实了。

于是旧党，实在也就是后党，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，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。而慈禧太后只是

冷笑，一无表示。

到了七月二十六，突然有一道电谕：“命直隶总督荣禄，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。”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。这天，八月初五回天津，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。

“恭喜，恭喜！”荣禄一见面就道贺，“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。”

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，嘉许袁世凯“办事勤奋，校练认真”，开缺以待郎候补，“责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事宜，着随时具奏”。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，并得专折奏事，直达天听。这是所谓“大用”的开始，非寻常升官可比，自然应该道贺。

可是袁世凯知道，在这道上谕中，荣禄最重视的是“责成专办练兵事务”这句话，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，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。这道上谕一发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，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，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，也是荣禄！

局势如一桶火药，而药线在自己手里，一旦点燃，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，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？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，一直到现在，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，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。

事机急迫，无从考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：见风使舵，随机应变。

心里闪电似的在转着念头，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，“这都是大帅的栽培。”说着，垂手请了个安，表示道谢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皇上的特达之知，于我何干？”荣禄问道：“京里的天气怎么样？”

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，大出袁世凯的意料。不

过略想一想，不难明白，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。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，老老实实回答最好。

“到的那天下雨，这几天很好。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。”

“喔，你住在那里？”

“住在法华寺。”

由此开始，荣禄接连不断地，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。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，使袁世凯大起警惕，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，荣禄会怎么想？他一定是在心里说：这小子，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？居心叵测，再不能信任了。

这样一想，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，趋前两步，轻声说道：“世凯有几句紧要话，密禀大帅。”

荣禄声色不动，只侧脸挥一挥手，说一句：“都出去！”

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，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，站得远远地，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，用痛苦的声音说道：“世凯今天奉命而来，有件事万不敢办，亦不忍办，只有自己请死！”

荣禄笑了。“什么事？”他问，“让你这么为难？”

“大帅请看！”

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，荣禄一看是朱谕，不觉一怔，但立即恢复常态，坐在原处细看。朱谕上写的是“荣禄密谋废立弑君，大逆不道！着袁世凯驰往天津，宣读朱谕，将荣禄立即正法。其遗缺即着袁世凯接任。钦此！”

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，关系重大，整顿全神，仰面看着荣禄的脸色。先看他读朱谕并不站起来，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，迹象不妙！转念又想，这是还不知朱谕内容之故。如果读完朱谕，面现惊惶，有手足无措的模样，便不妨乘机要挟，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，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，为人谋亦为己谋，好歹混水摸鱼，捞点好处。若是既不惊、亦不忧，至少亦会表示感谢，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，教他大大地见个情。

念头刚转完，荣禄已经读完朱谕，随手放在书桌上，用个水晶镇纸压住，板起脸说道：“臣子事君，雨露雷霆，无非恩泽。不过朝廷办事，有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，‘承旨’责在军机；定罪有吏部、刑部；问斩亦要绑到菜市口。如果我有罪，我一定进京自首，到刑部报到，那能凭你袖子里一张纸，就可以‘钦此，钦遵’的？”

这番回答未终，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，还差人一大截，眼看狂飚大作，倘不赶紧落篷，便有覆舟灭顶之危！

“大帅！”他气急败坏地说，“世凯效忠不二，耿耿寸衷，唯天可表。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，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！”

说到这里，痛哭失声。且哭且诉，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，三次皆是偕大殿廷，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谓“独对”。第一次是八月初一，垂询小站练兵的情形，当天就有“开缺以待郎候补”的上谕；第二次是八月初二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。

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。八月初三，荣禄曾有电报到京，说英国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，大沽口应加戒备；催袁世凯立即回任。而就在这天晚上，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，要求他带兵进京，包围颐和园，劫持慈禧太后。同时表示，皇帝将在八月初五，再度召见，有朱谕当面交下。

“一看朱谕，世凯吓得魂飞天外，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。世凯蒙大帅提拔之恩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有话明天再说！”

说完，将茶碗一端，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，拉起嗓子高唱：“送客！”

*

*

*

撵走了袁世凯，荣禄立即召集幕府密议，好得是先已有防变的部署，前一天已调甘军进驻离京四十里的长辛店。这时决定将聂士成的武毅军调防天津，监视小站的新建陆军。

在此同时，路局已接到命令，特备专车，升火待发。荣禄便衣简从，悄然上车，深夜到京，预先接到电报的步军统领崇礼，亲自在车站迎接。相见别无多语，崇礼只说得一声：“庆王在等着！”随即陪荣禄出站，坐上蓝呢后档车进城。

庆王府在北城，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。车进宣武门由南往北，穿城而过，到时已过午夜，庆王已等得倦不可当，勉强撑持，听得荣禄已到，精神一振，吩咐在内书房接见。

灯下相见，庆王讶然问道：“仲华，你的气色好难看！”

“怎么好得了？从本初进京，我就没有好生睡过一觉。”

汉末袁绍字本初，这是指袁世凯而言。在亲贵中，庆王是颇读过几句书的，懂他这两字隐语，也意会到他此行与袁世凯进京，特蒙皇帝识拔一事，有重大关系。便即亲自起身，掀帘向在廊上伺候的护卫与听差说道：“都出去！把垂花门关上。”

听得这话，崇礼觉得亦有请示的必要，等庆王转过身来，随即说道：“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我跟你请假。”

庆王不答他的话，看着荣禄问说：“受之不必走吧？”受之是崇礼的别号。

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礼，也是慈禧太后所赏识的人物之一，而且是步军统领，职掌京师治安，当然亦有参预最高机密的资格，所以荣禄一叠连声地说：“不必走！不必走！”

于是三个人围着一张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圆桌，团团坐定，崇礼先开口告诉荣禄：“老佛爷昨儿回宫了。”

“莫非得了什么消息？”

崇礼愕然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我还以为老佛爷知道颐和园不安静，所以又挪回来的呢！”

崇礼大惊失色，“荣二哥！”他急问说，“怎么说颐和园不安静？难不成新党派了刺客藏在园子里？”

“对了！新党派了个大刺客，打算派兵包围颐和园，跟老佛爷过不去。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”

等看过荣禄带来的那道朱谕，庆王和崇礼都伸一伸舌头，双眼睁得好大地，不住吸气。

“好家伙！”庆王说道，“皇上真有那么大的胆子！”

“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壮胆。”崇礼问道：“二哥，这道朱谕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庆王接口，“当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来的。”

“王爷猜对了！”荣禄接着问道：“王爷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“除了面奏老佛爷，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！”荣禄将身子往后一靠，“劳受之的驾吧，看是怎么样跟老佛爷见面？”

“好！”崇礼立即起身，“都交给我！我找‘皮硝李’去。回头我在贞顺门候两位的驾。”

等崇礼一走，荣禄才跟庆王谈到应变制宜之道。皇帝决不能再掌权，是不消说得，但应出以怎样的一种手段，却是非慎重考虑不可的。否则，会引起极大的动乱，招致“动摇国本”的严重后果。

“废立一事，决不可行。可是，仲华，”庆王一脸没奈何的表情，“你知道我的处境，我实在不便说话。祖家街有个可笑的谣言，说我两个儿子没有入承大统的希望，所以反对废立。这是从何说起？我就做再荒唐的梦，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。第一、我是高宗一系；第二、果然废立，以旁支继统，当然是为穆宗立嗣，继穆宗之统。算辈分也不对啊！我能糊涂到连弟兄、叔侄都搞不清楚不成。”

穆宗是“载”字辈，奕劻两子载振、载洵是穆宗的堂房弟

弟，自无以弟作子之理！荣禄也觉得“祖家街”的这个谣言，造得太离谱了。

“我就不服！”不大动感情的荣禄，忽然愤慨了，“莫非只有他‘祖家街’，‘翔凤胡同’就不够资格入承大统！”

“祖家街”与“翔凤胡同”这两处地名，指两处王府。恭王府原是和珅的住宅。乾隆末年，皇子私议储位，庆王奕劻的祖父、皇十七子永璘表示：“天下至重，何敢妄窥大位，将来但愿能住和珅的宅子，于愿已足。”及至乾隆内禅，皇位归于永璘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，即是仁宗。嘉庆四年，“和珅跌倒”，仁宗想起这段往事，就拿和珅的住宅，作为庆郡王永璘的赐第。咸丰年间，改赐恭王。不过这座王府在三转桥，恭王另在什刹海附近翔凤胡同，构筑别墅，命名“鉴园”。通常说恭王府，都指鉴园而言。所以荣禄亦以翔凤胡同，作为恭王府的代名。

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门大街以北，相传是清初降将祖大寿的故宅。端王载漪的府第，在这条街上。载漪是悼王奕諒的第二个儿子，承继为仁宗第四子瑞亲王之后，照清朝亲贵承袭的制度，降等袭封，瑞亲王绵忻之子奕詝承袭，降为瑞郡王，载漪是奕詝的嗣子，降等承袭为贝勒。载漪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，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就加了郡王衔，四年前晋封为瑞郡王。不道军机大臣糊涂，承旨时将“瑞”字误书为“端”字。上谕既发，不便更正，载漪就这样糊里糊涂成了端王。

端王载漪，与恭王的几个儿子，与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。如今要在近支中找“溥”字辈的作为穆宗的嗣子，则恭王府亦有资格。而载漪恃太后之宠，一心以为只有他的儿子，可以入承大统。荣禄在恭王生前，颇蒙器重，因而有此愤愤不平之言。

“你也别替人家发牢骚了！言归正传，我看，”庆王沉吟了一下说，“眼前只能在‘训政’二字上做文章。”

“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！”

“做文章容易。”庆王答说：“总要等‘见面’以后，才能放手办事。”

“见面”、“递牌子”、“叫起”都是朝贵常用的术语。军机大臣每日进谒，称为“见面”，庆王此时所说的“见面”，是指见了慈禧太后而言，未奉懿旨，一切都无从措手。于是，各自换了公服，两人同车出府，向东疾驰。

向来大臣上朝，都由东华门入宫，此时事出非常，驱车直趋宫北面的神武门。庆王与荣禄都是赏过“紫禁城骑马”的，守神武门的护军统领，已由崇礼打过招呼，明知他们进宫不由其道，依旧放行，让他们直到贞顺门下车。

贞顺门是宁寿宫的后门。这所乾隆归政之后的颐养之处，因为有一座畅音阁，是楼高三层的大戏台，所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，为了听戏方便，常住宁寿宫。此时崇礼与外号“皮硝李”的大总管李莲英，接着了庆王与荣禄，先将他们延入贞顺门西的倦勤斋叙话。

“老佛爷让莲英给叫醒了！”崇礼说道，“马上就可以‘请起’。”

“王爷跟荣大人有什么事面奏，我不敢问。”李莲英接口，“不过，得预备什么？请两位的示下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”

庆王点点头，看着荣禄说：“仲华，听你的！”

“今儿个怕有大举动。”荣禄答说，“最好避开皇上。”

“老佛爷本来打算今天仍旧回园，既然如此，就早早起銮罢！”

“颐和园又太远了。”

荣禄还在踌躇，李莲英已经有了答复，也等于作了答复：“那就挪到西苑。”

说完，李莲英就走了。不多片刻，有个小太监来通知“叫起”，同时指明：召见的是庆王与荣禄。

“受之，”荣禄便即叮嘱，“请你派个妥当的人，悄悄通知军机，预备老佛爷召见。”

*

*

*

召见庆王与荣禄，是在作为乾隆书房的乐寿堂，除了李莲英以外，别无太监与宫女。

跪过了安，庆王先奏：“荣禄是昨儿晚上十二点钟进京的，有大事跟老佛爷面奏。”

“说吧！”慈禧太后问荣禄：“你是袁世凯回天津以后才进京的？”

“是！”荣禄答说，“奴才有密件，请老佛爷过目。”

密件就是那道朱谕。李莲英从荣禄手里接过来，一转身呈上御案，慈禧太后入目变色，突出两腮，双眉之间，青筋暴露，牙齿咬得格格有声。庆王与荣禄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老太太有此可怖的形相，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噤。

真如雷霆骤发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慈禧太后忽又收敛怒容，平静地说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袁世凯一回天津就来看奴才……。”

荣禄将袁世凯告密，以及他的应变部署，从头细叙，一直谈到进京与庆王会面为止。话很长，一口气说下来，不免气喘，略歇一歇时，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说：“给荣大人茶！”

茶倒是现成，但茶具都是上用的明黄色，非臣下所能僭用，因而颇费张罗，于是慈禧太后又开口了。

“就拿我用的使吧！这是什么时候，你还在那儿蘑菇！”

“君臣的礼数……”李莲英已找到两个乾隆青花的大酒钟，权当茶——一面倒满，一面头也不回地答说：“大规矩错不得一点哟！老佛爷就有恩典，人家也不敢喝呀！”

说着，已倒了两钟茶来。庆王与荣禄都先磕了头，方始跪在地上，双手捧起茶钟，“咕嘟，咕嘟”一气喝干。

就这当儿，慈禧太后已想停当了，“袁世凯可恶！他这是曹操给董卓献宝刀嘛！”她重重地说，“这个人可万留不得了。”

荣禄大惊，“袁世凯是人才，求老佛爷开恩。”他向庆王看了一眼，“奴才知道袁世凯本心没有什么。再说奴才也制服得住他。”

庆王受过袁世凯一个大红包，兼以荣禄的示意，便接口帮腔：“老佛爷明鉴，如今办大事正要收揽人才。袁世凯纵不足惜，但如老佛爷饶不过他，怕替老佛爷办事的人会寒心。”

“而且，”李莲英插嘴说道：“也叫景仁宫看笑话。”

珍妃住西六宫的景仁宫，她如果知道袁世凯告密而被诛，当然会抚掌称快。慈禧太后醒悟了，“亲痛仇快”的事不能做。

“好吧！我饶了他。不过，荣禄，你得好生管住！”

“是。奴才制得住他。”

慈禧太后点点头，转脸吩咐：“把匣子拿来！”

李莲英答应着，立即取来一个专贮奏折的黄匣子，打开了小银锁，慈禧太后亲手检出一件奏折，交荣禄阅看。

这个折子是两名御史联衔，在八月初三那天，到颐和园呈递的。这两名御史，一个叫杨崇伊，江苏常熟人，热中利禄，不惜羽毛，敢于为恶，曾经一折子参倒珍妃的老师、翁同龢的得意门生，为一时大名士的江西萍乡人文廷式，因而颇不容于清议。

另一个是湖北江夏人，张凯嵩的儿子张仲炘。张凯嵩久任督抚，宦囊充盈，所以张仲炘是个席丰履厚的贵公子，做官的宗旨，与杨崇伊相反，利心较淡，名心甚重，由编修转任江南道御史以来，便以敢言著称。

杨、张二人联衔所上的折子，自然是向皇帝陈奏，但此折子又不能让皇帝寓目，所以特地到颐和园呈递。因为，慈禧太后自入夏为始，一直驻驾颐和园，皇帝间日省视，亦经常在那

里处理大政，臣下到颐和园向皇帝奏陈，亦是常有之事。杨崇伊便是利用皇帝往来不定的这个漏洞，能将奏帝的折子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。

折子的内容，是得风气之先，抢一个“拥立”之功，请慈禧太后三度垂帘。只是，既已“归政”，不便再公然收掌大权，所以仿照嘉庆即位，乾隆以太上皇的身分，仍旧干预政务的故事，现成有个“训政”的名目，可以借用。

这个折子，荣禄不必再看，因为杨崇伊事先到天津商量过的。荣禄当时表示，“不妨上了再说”，做个伏笔，如今别无选择，唯有运用这个伏笔了。

“那末，你们去预备！”慈禧太后问李莲英，“今儿个，皇帝要干些什么？”

“除了召见四位‘新贵’，还得驾临中和殿‘阅祝版’。”

“这会儿，皇帝在那儿？”

“多半还在景仁宫。”李莲英答说，“奴才马上派人去打听。”

一听景仁宫，慈禧太后便不自觉地怒气上冲，“不用打听了！”她说，“咱们就去吧！”

荣禄不能确知慈禧太后到了景仁宫，跟皇帝见了面，彼此会说些什么？不过，皇帝作何表示，可以不管，如今顶要紧的是，须决定慈禧太后在何处召见军机？

这样想着，便陈奏请旨，慈禧太后并无意见，反问一句：“你们看呢？”

“奴才的意思，请老佛爷在西苑办事。”

“也好！你们把杨崇伊的折子带去。”慈禧太后随即又吩咐李莲英：“回头咱们就由景仁宫，一直到西苑。”

“喳！”李莲英答应着，向荣禄使个眼色。

这是暗示他可以“跪安”了。于是荣禄又拿肘弯碰一碰庆王，两人磕头跪安，辞出殿去，转到隆宗门内，离军机处不远

的内务府朝房，派人先将崇礼找了来接头。

“已经通知过了。”崇礼低声说道：“刚中堂说，他盼这一天很久了！要怎么预备，最好赶快通知他。”

“仲华，我看，这会儿就把刚子良请了来谈一谈吧？”

荣禄考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“这会儿还不必。”接着又转脸对崇礼说：“受之，劳你驾，悄悄儿把钱子密给找来。”

“好！我自己去说。”

子密是钱应溥的别号，浙江嘉兴人，军机章京出身。同治年间为曾国藩奏调出京，在他幕府中专司章奏，曾国藩歿于两江总督任上，钱应溥复回军机，由章京而“达拉密”——军机章京领班，由达拉密而超擢为军机大臣，为人明敏通达，笔下更是来得。荣禄觉得这件大事，必须通过军机，而军机大臣中，只有跟钱应溥商量才有用。

庆王比较持重，认为应该告知刚子良，就是刚毅。此人籍隶镶蓝旗，在刑部当司员时，因为熟于律例，勇于任事，颇得当时的尚书翁同龢的赏识，外放为潮嘉惠道，升监司，当巡抚，所至有声，算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。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以后，翁同龢以师傅之尊与亲，得君独专，颇为弄权。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，大东沟一战，海军大败。朝局一变，恭王复起，翁同龢、李鸿藻再入军机，刚毅亦由于翁同龢的密保，由广东巡抚内召，以礼部侍郎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在仕途中，这一步可是跨得大了！照道理说，应该感激翁同龢才是，然而不然！

翁同龢倒是绝非喜欢摆架子的人，亦很少疾言厉色。但以刚毅既是旧属，又有新恩，言语词色之间，当然比较率直。刚毅没有读过多少书，爱掉文而常念白字，提到大舜称为“大舜王”，只是识者摇头，将阜陶的陶，读如陶器的陶，也还不觉刺耳，可是以当国执政的枢臣，“茶”毒生灵，草“管”人命，琅琅上口，这种笑话，可就伤害到政府的威严了。因而有一次，

翁同龢忍不住当面纠正，刚毅面红过耳，唯唯称是，但心里引为大恨，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。

到了这年春天，翁同龢因为赞助皇帝维新，又与为慈禧太后及旧党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扯上关系，所以为跟翁同龢有宿怨的荣禄所排挤，落得个“革职永不叙用，驱逐回籍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的凄凉下场。而在荣禄下此杀手之时，刚毅在暗中颇尽了些力量。而荣禄并不感激，反觉此人刻薄无义，存着戒心。同时，他亦很不满刚毅刚愎自用、横行霸道的作风，觉得新旧之争搞得如此势如水火，以致太后与皇帝母子之间，竟如仇敌，刚毅在其间推波助澜，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所以这件大事，不愿与他商议。

庆王见他态度坚决，便不肯多说，等钱应溥到了内务府朝房，亦仍旧让荣禄去跟他细谈。

*

*

*

就在这时候，慈禧太后已带着大总管李莲英、二总管崔玉贵，以及大批的太监、宫女，由宁寿宫出蹈和门，进苍震门到了“西六宫”之一的景仁宫。

景仁宫是珍妃的寝宫，亦是皇帝经常临幸之地。珍妃得报，心知慈禧太后的来意不善，深怕错了礼数，又遭谴责，赶紧出宫跪接。慈禧太后却理都不理，让李莲英搀扶着，上阶入室，往正中所设的宝座上一坐，随即喊道：

“崔玉贵！”

“喳！”崔玉贵的嗓子，雌音特重，加以高声应答，亢直尖厉，入耳令人心悸。跟在后面的珍妃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

不过，她总算抢了个先，越过捧着个大肚子的崔玉贵，跪在慈禧太后面前说：“奴才给老佛爷请安！”